

美国
以赛亚·伯林

卡尔·马克思

卡尔·
马克思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生平与环境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李寅——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 / (英)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著; 李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8.10

(伯林文集)

书名原文: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ISBN 978-7-5447-6827-6

I. ①卡… II. ①以… ②李… III. ①马克思 (Marx, Karl 1818—1883)
—传记 IV. ①A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2137 号

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 [英国] 以赛亚·伯林 / 著 李 寅 / 译

责任编辑 马爱新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827-6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本书以卡尔·马克思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发展为主线，从他在德国的成长与求学，在巴黎的工作与斗争，一直写到流放伦敦的最后岁月，涉及青年黑格尔派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论》出版等众多历史事件，完整勾勒出了马克思传奇而动荡的一生。伯林在书中尤其关注马克思在各个阶段的思想发展轨迹，客观评述了他在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力图还原马克思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伯林对马克思的研究摆脱了后续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二次阐释的影响，从历史文献与马克思本人著述出发，生动呈现了马克思富于人性色彩的真实面貌。

谨以此书纪念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第五版编者前言

作者将诸多深奥且晦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另外一种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卓越能力，及其展示个性、特征、态度与理论问题之间关系的高超本领，在现有的文献领域可谓一枝独秀。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1]

以赛亚·伯林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学术传记第一次在1939年出版，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对传主的生平和思想最出色的、最简明扼要的阐述，伯林在此书结尾将传主的理论描述成“至今仍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学术力量中”“最强大的”。伯林有着同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产生共鸣的著名本事，他进入了自己笔下主人公的头脑中，由内而外地向我们呈现了其中的观点：^[2]没有多少专门术语，也没有太 xi

[1] 对第四版的批注，1978年。

[2] 伯林高超的表述才能不止一次地让读者搞不清楚，他所阐述的笔下主人公的观点和他自己的观点之间界限到底在哪里。本书出版后不久，在1939年10月29日，伯林的朋友玛丽·费希尔在给她的朋友弗洛拉·拉塞尔的

多马克思本人文章中常见的晦涩，他呈现、阐释了马克思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起源和力量。

第一版的评论家们马上看到了这本书的优点。俄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查奎斯称其为“客观清晰的一个典范”。^[1]英国历史学家 A. L. 劳斯写道：“伯林先生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堪称典范，总体而言，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出色的介绍。[……]这本书最伟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没有先入为主，并且采用的是完全客观、毫无偏见的研究方法。总之，它使得马克思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家，都变得明白易懂；而且不带有任何不适当的个人崇拜。”^[2]

经过了四十多年，评论依然同样肯定，例证之一便是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的判断（他是 20 世纪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在上面被引为题记。而且，正如艾伦·赖安与特雷尔·卡弗在这一新版本（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出新版）中收入的文章里所解释的那样，伯林的阐述直到今天读来依然是那么清新、有说服力，而

信中写道：“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上个礼拜天，科琳和我见到了伯林夫妇（父母），伯林夫人不得不承认，每个周末，伯林先生都会向她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她总会时不时打断他问道：‘这是马克思还是沙雅？’他也总是再三保证：‘不不，这就是马克思，不是沙雅。’”（沙雅是指伯林。——译注）

[1] R. D. 查奎斯，“以马克思之名”，《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39 年 10 月 7 日，570。他还写道：“人们总会希望伯林先生能更偏好使用短一点句子，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那详尽细致，以及近乎新奥古斯都式的精确风格并非没有魅力。”

[2]《政治季刊》11 no. 1（1940 年 1 月），127—130，在第 128 页。

且显然没有受到自从本书第一次面世以来所出现的关于马克思的学术洪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劳斯所赞扬的那种超然。

二

这本书至今依然十分重要，对于一个至关重要但同时也众所周知让人头痛的题目，它作为最成功的介绍性作品之一，也还没有任何被别人超越的迹象。然而，即便是在历经四十多年，作者接连修订四个版本之后，在作品中依然存在着一一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为了解释清楚这么说的含义所在，我有必要简单介绍一点自传性的内容。

此书的上一版本是1978年出版的。当时我担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负责那一版的出版工作，而且那时候我还正在负责编辑四部伯林文集（不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这些文章最初是以《作品选集》的名称出版的，那开启了我至今还在继续从事的伯林作品编辑工作。那时我的工作并不需要对《卡尔·马克思》给予他所有作品必需的那种处理，以便（用他自己很有特点但又过谦的话来说）能将“纯文学的东西转为学术性的东西”。^[1]但是以我对待他其他作品的经验来看，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

[1] 引自伯林的秘书帕特·乌捷欣写给亨利·哈代的信，1997年12月12日。

到，终有一天，这本书应该用这种精神去对待。引用的内容没有标明出处，有时还张冠李戴，经常有点不精确或者更糟。开篇引用约瑟夫·巴特勒的话，短短二十三个单词中却至少有三处错误。标点符号的使用经常不规范，在形式与内容上还有许多其他小瑕疵，而这些是前几个版本的出版方应该挑出来，并可予以消除的。

xiii 我并不想夸大其辞，大体上这仍然是同一本书。但是为了避免我提到的那些瑕疵被人认为微不足道，让我举个例子（诚然是很极端的）来说明伯林的学术细节可能怎样不可靠。即便这种不可靠并不会使他的作品变得多么具有误导性，即便在一些情况下有人会觉得他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人们总会想到他写作此书时文献资料和技术环境都相对落后（更不用说 20 世纪 30 年代流行的相对宽松的学术标准），^[1]人们依然无法否认（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一样）他经常无法保证自己引用的话语和标明的出处（如果他标记了的话）是准确无误的。

在前几个版本中，本书第 257 页^[2]以“这种英国例外论”开头的那段文字如下：

“在英国，”他这样写道，“长期以来的繁荣使工人们削

[1] 关于这些，参见（已作必要修正）本人编辑出版的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对 18 世纪参考书目的注释（伦敦，1999），xiv/1。

[2] 指英文版页码，见本书边码。下同。——译注

弱了士气……这个最具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的最终目的，似乎就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阶级和一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存在……英国工人的革命精力已经慢慢消退殆尽了……他们要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传染，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完全缺少以前宪章运动者们的那种精神。”^[1]

此处他认为这几段文字都源自同一出处（没有标明其身份、收信人或日期）。事实上，从第 257 页中可以看出，由省略号隔开的五段文字分别来自不同的书信，其中三段来自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两段来自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前后跨度有十一年之久。该赞扬的还是要赞扬：伯林从不同出处将这些文字攒到了一起，并且看出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看出了它们所揭示的问题。但同时该批评的也要批评：也许在这个例子中，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种学术上的粗心而有所得失，但它值得纠正，哪怕只是作为原则问题。 xiv

三

通过第五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重新排印和发行，终于提供了一个机会和激励，可以开始必要的修订与标注工作。伯林所引用的许多作品之完善版本的出版（更不

[1] KM1 (267/169) 241—242.

要说互联网对于学术研究带来的变革性影响),使得人们更加容易保证对于原文的忠实性,其中有一些本来是用英语写作的,却被伯林从其他语言版本重新翻译过来——这也是他写作时唯一能接触到的素材。而且,英语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Collected Works*)已经行世,印刷本和网络资源都可找到,也使得对于引用的那些作者的文字,采用记录卷数与页码的简单标注方法成为可能(如: CW 20: 45)。^[1]

伯林经常在翻译时带有一些创造性。他的翻译版本中并非毫无理由的不准确之处,经常没有改正到与《全集》相一致;如果内容明显错误,或者另一翻译版本更加通用,那么《全集》中的版本往往会被采用。

特雷尔·卡弗对于伯林引用的大多数文字具有专家的辨别水平,因而加快了识别、标注、检查、修订的进程,而我也大大得益于他一直以来令人愉快而有益的帮助。我还感谢他更新了延伸阅读指南,并且同意将我写的稍做过修改的《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作为后记加了进来——这篇文章最初是在乔治·克劳德与亨利·哈代主编的《一和多:阅读以赛亚·伯林》(纽约,2007)中第一次发表的。我还要感谢其他一些在特定问题上向我提供过帮助的同事和学者:施洛

[1] CW (《全集》),尽管书名如此,其实并不完全,但是伯林没有采用未包含在内的马克思或恩格斯的素材(每当想要将单独出版的作品与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等区分开来时,都会遭遇界限模糊的情况:因此在CW中几乎所有标题都以斜体字母表示)。

莫·阿维内里、艾尔·伯特兰德、约翰·卡洛、乔舒亚·L. 彻尼斯、乔治娜·爱德华兹、斯蒂芬·格罗斯、尼克·霍尔、于尔根·赫雷斯、海伦·奥尼尔、乌尔里希·帕格尔、塔季杨娜·波兹尼亚科娃、于尔根·罗雅恩、诺曼·所罗门、西蒙·图博，以及约瑟芬·冯·齐第维茨。

这一版中的脚注都是编者所加，除非作者将某处评论变成了注释。哪些是作者的注释应该一目了然，但是为了避免疑问，编者所加的文献书目以外的注释都用方括号括起来了。不同文页的交互参照仅通过页码标明；对注释的参照则采用“123/4”的形式，表示第123页，注释4。

本书第一版的很多草稿以及研究注解保存了下来，反映了这本书是如何写成得以出版的。有一个因素是本书发表时系列丛书“家庭大学丛书”的编者限定了篇幅，使伯林不得不对原稿大肆删减。^[1]快完成修改工作时，他给自己的朋友克雷西达·博纳姆·卡特这样写道：“我**一定要**完成马克思传，现在只需要再删掉7000个词就可以了：这绝对是一项令人讨厌的工作，每天晚上我都要把一小滴一小滴的血攒下来，然后量量杯子：所有辞藻华丽的段落都删掉了，现在该

[1] 最初的合同中规定的字数为50 000个单词，后来根据伯林的请求，在1938年增为65 000个单词。伯林写成时超过了100 000个单词，删改到75 000个单词的出版篇幅。费希尔曾告诉他，“按照‘家庭大学丛书’的标准从最初的篇幅删减下来——这我在1936年就曾提过——才会使之顺利出版”（IB，致诺埃尔·安南的信，1973年8月31日）。

删事实描述了，如今我都是怀着一种报复心理，快乐无比地欣然将其删除。”^[1]

xvi 在伯林的有生之年出版了三个版本，尽管1960年重印本中做了增补（最初是为1959年德语翻译版所提供的），比起略做修订的1948年那一版来，可以更恰当地称为一个新的版本；但是该书于1948年从桑顿·巴特沃斯公司转到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事件也很自然地引人注目。对本书第一版出版前后写作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以赛亚·伯林虚拟图书馆，在那里收录了关于这一话题的信息，包括第一版的完整版本，其中很多删减的内容都被重新收录进来了：参见 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

伯林将这本《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献给他的父母玛丽与门德尔·伯林，是他们给了他生命，并且提供了塑造他的环境。谨以这一版纪念他们。

亨利·哈代

2012年8月于赫斯沃尔

xvii

[1] 1938年8月28日书信，见以赛亚·伯林，《伯林书信集·飞扬年华：1928—1946》，亨利·哈代编（伦敦，2004），280。

前 言

艾伦·赖安

《卡尔·马克思》是以赛亚·伯林的第一本书。此书出版时他还只有三十岁。当时在牛津和伦敦，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耀眼夺目的健谈之人，也是位颇具天赋的青年哲学家；但正是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他才第一次显露出自己作为一名思想史家的特殊才华——通过这门学科，他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深深打动了他的读者。这种才华，就像类似天资通常给人的印象一样，往往更容易去倾慕、欣赏，却不那么容易描绘出来；但它表现为公平对待思想家和思想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能力——为自己笔下的男人和女人的个性画上一幅肖像，时刻都牢记，我们之所以想要了解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婚姻的冒险或者穿着的品位；并且把这肖像画得栩栩如生，只是因为，尽管思想也有自己的生命，但它们依然刻有作为其主人的男人和女人的个性印记。

伯林有这一种特殊才能，才使得他所写的关于伟大思想和人物的文章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艺术形式。正如读过他的选集的读者们所知道的，《个人印象》（收录了与同时代人的会晤、纪念演讲，和对那个世纪伟人们伟大之处的描述）在语气和风格上都和他的《俄国思想家》或者《反潮流》（思

想史的姊妹篇)几无不同。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对话,却从未和屠格涅夫对过话,他和刘易斯·纳米尔讨论过18世纪的英国历史,却从未与马基雅维利讨论过佛罗伦萨的历史,这看起来并不重要。据说,所有严肃的思想家都生活在一所“看不见的大学”里,在那里,活着的与已死去但不朽的人之间进行着一场静默的对话,柏拉图和刚入学的纠结于自己功课的研究生同在现场。伯林的作品展现了一些形象,要比多数大学来得更加生动、更有生机,也许算得上一个广大的学术晚会,那里的客人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不同行业。不管人们最喜欢什么样的比喻,其结果是将其笔下的主人公完整地、透彻地呈现出来。

思想史家毕竟不是小说家,甚至连传记作家都算不上。尽管《卡尔·马克思》还有一个副标题“生平与环境”,伯林主要想去描述的却还是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的一生,伯林所感兴趣的环境并非指马克思度过少年时代的特里尔或者度过流放岁月的北伦敦,而是马克思写成《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不过,《卡尔·马克思》寓意式的结尾应该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一个评价;在其最后一段,伯林这样写道:

[马克思主义]原本想要反驳思想支配历史进程这个观点,但它自身对人类事务的影响程度削弱了它的观点的力量。因为,在改变关于个人与其环境和同伴之间

关系的普遍观点时，它显然改变了那个关系本身；因此，在至今仍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学术力量中，它依然是最强大的。

马克思主义通过受其激发而兴起的共产党的行动，最终却成了针对创立这一学说之人的超级哲学笑话。马克思是一位理论家，认为个人不过是广大而客观的社会力量的玩具而已；但是作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启发者，个体的马克思本人却是广大社会力量的发起人。马克思认为思想就是副现象，是被它们掩饰、合理化的社会利益的反映；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却改变了这个世界——讽刺的是，即使这种改变是通过他可能会最感遗憾的方式发生的。《卡尔·马克思》一书给读者带来了许多欢乐，其中不小的一点就是伯林描绘的反讽画面：它的主人公发动了一场对其一生努力构成质疑的历史戏剧。 xx

伯林后来又针对历史必然性学说，针对通过抽掉其中的道德与政治考量而使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做法，进行了详细讨论。马克思就是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的这些观点最明显的灵感来源。很难让人相信，他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愤慨不是由强烈的正义感所激起的，但他经常声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会取代一切对现有秩序的“道德化”^[1]批判。恩格斯至少

[1]《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CW 6：318。

也曾经说过，马克思所揭示的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法则和“现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法则，^[1] 这些法则都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且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在马克思的批判者中，伯林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注意到如下矛盾的：他公开声称的对道德考量的漠不关心，与他对工业革命早期如此常见的不公与残酷的明显憎恨并不相符；他关于资本主义秩序必然灭亡的断言，与他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自己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的做法同样并不相符。伯林对马克思的反应有别于他人之处，不是在于面对着这些逻辑上的矛盾和不一致，而是在于，伯林将自己此后的学术生涯都用在了思考与书写这些矛盾的起源、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以及马克思同时代和后继的做着同样思考的人物。

伯林笔下的马克思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因为他既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也是反对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就像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马克思相信进化，相信历史就是一个线性发展进程，而不是像古时候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发展与衰败不断循环的过程；但是，和柏克、迈斯特与黑格尔这些启蒙运动的批评者一样，他也认为社会变化在过去就不曾，将来也不会仅仅因为有几个开明人士认为“换一种行为方式更加有道理一些”而发生。带来重大变化的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力量，整个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是只

[1]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CW 24：467，468。